

不平等的现代性与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一评卡尔 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一

李 凱航¹

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中，“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展开一直是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2008年，纽约大学瑞贝卡教授(Rebecca E. Karl)出版的《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²一书正是针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强调欧美(包括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刺激作用，本书所要探求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后拉丁美洲反殖民与民族主义革命大潮”的强烈共振。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导论》中所言，“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与其他非欧美地区的越来越强的认同最初使得现代世界作为一个有结构的总体显现出来。(中略)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意识形态构成成分最初是通过与这一总体性相联系而发展出来的，这一总体性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平衡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表述、力量的不平衡(4页)。”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意味着欧美日向全球的殖民扩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反殖民反侵略运动的兴起，“它们包括菲律宾、夏威夷和古巴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斗争；初期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南非布尔人反抗英国人的斗争；波兰、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主义、反抗领土分割的斗争和将他们自己重组为民族国家政体的努力；越南反抗法国的斗争(21页)”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思考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关键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晚清全球性和民族主义可以被合理地看作一个需要把不均

衡的全球空间挪用到重新定义中国和世界这一未完成的历史工程上的层叠过程(13页)。”透过它，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由历时性的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够在势不可挡的欧美、日本强权的环境下被建造为全球重建的活跃场域(21页)。”

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们正是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观察和体认，重新获得了民族主义的自觉性。那些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不是作为惰性的地理名称或不幸的亡国之地，而是作为创造和表演崭新的全球、国家、地方的意义、实践、历史的具体场所出现的(22页)。”作者特意提醒到，通过这些观察与体认，“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被创造出来(17页)。”

比如在第二章中，作者详细地探讨了晚清知识分子对波兰的看法。众所周知，波兰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因被瓜分而亡国。在19世纪末期的世界地图上，其实是没有“波兰”这个国家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热衷于探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是因为“波兰的现代命运(瓜分)与中国的潜在命运(即将到来的瓜分)”有着不言而喻的相似性。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不存在的“波兰”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现代世界的隐喻(43页)”。特别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波兰”转变为一个有力的对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策略不足之处的控诉，一个意味着“瓜分”的同义词：“支那而不自立也，则波兰我”。在晚清中国的语境中，波兰“既是一个所有名词，又是一个动词”(44-45页)。康有为(1858-1927)在呈现给光绪帝的《波兰分灭记》中称波兰亡于保守的官僚压制爱国的精英；而

梁启超(1873-1929)在《实学报》上发表的《波兰灭亡记》则指责波兰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帮助人民反抗俄罗斯,反而与俄罗斯勾结镇压爱国的进步人士。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其意义可想而知(45-46页)。

然而,康梁被迫流亡海外以后,有关波兰的论述也悄然变化:波兰从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清政府引以为戒的形象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人民反抗而可以争取自由的形象。“一个仍然有着活跃的‘民族’的‘亡’国,而这个‘民族’是可以复活波兰这个民族国家而不是波兰政府的(48页)”。日本留学生的刊物《浙江潮》和《江苏》撰文赞美波兰人民用起义、暗杀、罢工等手段反抗殖民侵略,柳亚子(1887-1958)在《波兰衰亡记》的《序言》中告诫中国人也应该有反抗精神,鲁迅(1881-1936)在《摩罗诗力说》中赞美波兰民族英雄密茨凯维支(1798-1855)等等。“人们认识到尽管波兰国家确实灭亡了,但是人民或者民族国家是绝对没有消失的。”这一波兰形象的转换:“从‘亡国’到‘当代人民斗争的所在地’,其关键在于理论与概念上的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区分,以及对‘国’的定义发生了从‘国家’到‘民族’的变化的重新阐释(49页)”。从对波兰的讨论来看,中国人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现代概念了。

在第三章中,作者详细探讨了生活在太平洋地区的华人是如何被纳入进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清王朝的衰落使得传统的“中国性”(Chinese-ness),即由王朝/帝国=儒家/文明所构成的一套文化观念备受质疑。在新的有关“中国性”的争论中,不论是清王朝、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越来越希望获得来自海外华人的支持(72-73页)。梁启超与孙中山(1866-1925)都先后去檀香山募集资金,而清王朝也在1860年代后在海外设立领事馆。原本在海外的华人一直被清廷视为是叛徒,不用说得不到清廷的保护,一旦发现都可能会被处罚。可是在1893

年,清廷也正式废除了禁止移民的法案,并开始承认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74-75页)。

清王朝对海外华人的漠视是与近代民族主义的迟钝有关。当1881年夏威夷国王加刺鸠(Kalakua,1836-1891)造访北京,告知李鸿章(1823-1901)夏威夷的华人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瘟疫,以及他们自身可能被白人征服的危险时,他无动于衷(81-82页)。然而1899年,梁启超从日本来到夏威夷,听闻华人为反抗美国殖民者而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他却从华人身上寻找到为民族主义珍视的可贵品格。他期望华人“不仅在资金筹措上,而且在精神上、行动上也能带领中国人民渡过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96页)”1900年,当夏威夷的华人再次出现在林獬(1874-1926)的白话文小说《檀香山华人受辱记》时,虽然他们作为商业上的成功者而被赞美,然而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失败者,他们却与大陆华人紧密相连,因为“清朝保护夏威夷侨民和本国民众的失败使得两地华人都成为‘中国人’和‘亡国奴’(108页)。”据此,作者认为,海外华人之所以对民族主义构建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表面上对“人民”给予希望,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操纵中却不信任“人民”。因此,海外华人在民族主义者的构思中占据了一个“特权”的位置。而南洋华人之所以没有被纳入民族主义者的视野,是因为南洋华人是与饥荒、兵变等传统的帝国秩序变数有关,而以夏威夷为代表的太平洋华人则是“十九世纪资本重组和与之相伴随的世界‘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110-111页)”。

在第四章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将菲律宾的革命与自身相联系,借此,“诸如‘人民’、国家、现代化和历史这些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主题变得明确起来(115页)。”19世纪末,随着中国国内的变法运动失败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清王朝的权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117页),菲律宾反抗殖民主义者(西班牙和美国)这一事件逐渐做为革命的典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热议起来:梁启超把菲律宾看成是三

十年前明治维新的日本(122页);欧榭甲(1870-1911)认为菲律宾成为了新的榜样(124页);林獬则详细研究菲律宾的精英与民众如何联合起来的问题(132-133页)。1903年,当汤调鼎(1871-1940)批注庞斯(Mariano Ponce, 1868-1918)的《菲律宾战史》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菲律宾的观察从政治经济发展至历史文化。其中,他惊讶地“发现欧洲国家将他们殖民别国的历史当做本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来讲诉,(中略)他非常自觉地将这种从对菲律宾考察中得到的对于叙述和历史的洞察力扩展到埃及、波兰、古巴、南非以及现在的中国(149页)。”“历史”被殖民者所垄断。因此,反观菲律宾革命之时,“革命”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内部的社会政治事件,由于帝国主义历史主义的话语力量,革命是一个要求获得世界并且针对世界的事件(151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称菲律宾是“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与民权之始祖”(152页)。“如果说1897年,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关于振兴‘真正的’儒教的讨论,但到1903年为止,与世界其他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可行甚至必要的方案(157页)。”这不仅仅是关乎种族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把革命看成是现代身份的认同。”在菲律宾革命被彻底镇压以后,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新的对现代世界的殖民主义的认识,“菲律宾革命的重要意义不再与具体事件相关联,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普遍主义的态度,重新与中国的民族国家问题关联起来(159页)。”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观察近代的非洲,并且透过它发现“一个落后的民族应当如何宣称自己的现代性和民族国家主义(163页)。”依靠早期西方传教士提供的信息,中国人往往认为非洲人是“奴隶”形象的典型(167页),然而,布尔战争(1899-1902)的爆发使得非洲人从“奴隶”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值得“推崇的民族”。中国人很快发现军事化的社会结构是布尔人得以抵抗英国侵略的关键所

在。这让他们明白,“民族作为自觉的多个个人和一个有意识形成的集合体,如果愿意并且有能力自卫,那么与入侵者的斗争是可能成功的(184页)。”然而,就如何重组中国社会,国家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国家主义者支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而这里的“人民”应该是“全体公民”,他们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欧美帝国主义;而种族主义则认为排满革命是首要任务,中国的“人民”仅仅是“汉族”,而中国最大的敌人则是“殖民主义”(161-162页)。因此,“改良派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更加倾向反帝,而更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却是相对较少反帝的,是更加反殖民主义的。这一结果是由于把满族和西方殖民势力历史地对等起来的缘故(163页)。”这一分歧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被扩大了:种族主义者认为“义和团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满族的‘他者性’,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民族本质(即汉族)”(193页);国家主义者则呼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应该培育出更多积极的现代国民(195页)。

与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农民表现出的落后与愚昧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布尔人则是由一群“赤忠、传奇化的射手”组成,他们与中国流行的武侠形象不谋而合,又与德川幕府时代的“志士”相得益彰(185页)。“布尔民族团结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得中国人所理解的民族变得更为具体化。然而,与义和团的失败一样,不久以后布尔人的失败同样扩大了中国人的分歧:梁启超抵制把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危机转移到另一个假定的、内在的他者身上,而越来越依靠以国家为中心来度过现代世界的危机。与此相对,像章太炎、孙中山、刘师培(1884-1919)这样的知识分子逐渐以文化、种族、民族这些术语来应对现实中的危机(202页)。作者认为,在1904年,通过对布尔战争的观察,在中国,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分歧被明显地扩大了。

在第六章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重新阐释“亚洲”这一概念从而以服务于自己

的革命实践(219页)。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一个新的以日本为主导的霸权主义的亚洲概念”迅速扩展开来(214页)。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争夺“亚洲”概念的解释权,“那些从前被中国忽视的人群(菲律宾人、暹罗人、印度人、缅甸人等)和那些从前划归于不同类别的地区(如南洋)被纳入‘亚洲’”。原本是用以形容中日两国的“同文同种”的关系,扩大到了整个亚洲地区。一种新的中国与亚洲的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被想象出来,“这种联系不依存于当前日本的中心地位,不依存于中国先前的中心地位,也不依存于盲目接受西方的东方主义地理划分(219页)。”比如,印度一直被中国人理解为是消极与落后的民族,被置于亚洲最受黑暗的地方,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可以辨识的革命行动。然而,在1905年,当章太炎他们在东京发现一群受过英国精英教育,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印度激进分子时,这一看法得以修正(227页)。章太炎甚至还从佛教的联系发现了中印两国的历史渊源(232页)。另一方面,梁启超很快关注了反殖民运动的越南领袖潘佩珠(1867-1940),在其著作《越南亡国史》中文版的序言中,他感叹中越两国精英阶层交流的古汉语在不断地亡失(229页)。

然而,就在这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的文化、种族关系被不断加强时,满族则被描绘成渐渐外在于这种联系,并且是破坏这种联系的国家。满族不仅仅在政治上还在文化上剥夺了中国国粹,而且他们本质上也是外在于“亚洲”的(231-232页)。正如章太炎所感叹的,“百余年间,欧人东渐,亚洲之势微,(中略)印度先亡,支那遂沦于满洲(238页)。”满洲与英国一样,是亚洲的入侵者。“欧美造成的亡国在时间上被投射回过去,被用来把‘亡国’和欧美国家出现以前的满洲/莫卧儿联系起来(240页)。”作者认为,像章太炎和刘师培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文化与人民而不是国家或官僚精英把亚洲这一概念想象出来的(243页)。但是,这种旨

在加强各地联系以强化革命逻辑的亚洲观,到革命真的要到来之际,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246页)。

在第七章中,作者探讨了土耳其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不同于十年以前的开放性,在对1908年土耳其革命进行观察时,有关“民族”、“国家”、“种族”等涉及国家定义的概念已经通过波兰人、菲律宾人、布尔人等等历史事件的争论基本成型了。因此,在对土耳其革命进行的讨论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需要通过革命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论来界定其模糊的定义,而是被直接“工具化地用来为早已形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248页)。”在此,同盟会成员基本上垄断了对1908-1910年间土耳其革命事件的解释权。比如胡汉民(1879-1936)特别强调在土耳其革命中“军队”的作用:他们既反映和保护某种种族感情,然而又不忠诚于政府。这种形象的军人取代先前被赞誉的“海外华人”成为理想的民族主义代理人(262-263页)。土耳其革命已经为中国的革命者证明目前关于国家构造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大众”的种族民族主义革命,它的“大众”内容将由已与政府决裂且尽忠于共同的种族感情的军队来提供(264-265页)。通过对土耳其革命的观察,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军队”从“政府”中剥离出来,转而去效忠于种族感情,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效力。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似乎与汉人要使中国摆脱满族这一已被察觉到的迫切性相似”,而且这种理解在迈向民族国家的新情况下,完成了在此前十年中,将旧式的帝国君主统治与现代的帝国主义相合并的倾向(265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在《结论》中谈到:把全球性作为一个共有的历史条件与世界舞台来理解,这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相当新颖的。中国当时的困境与这个新近被把握的全球性空间和概念相联系,正是从这个全球性的空间和概念出发,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与复杂的全球历史紧密相连的话语以及与当时中国特殊情

况相连的一系列的实践就形成了(268页)。因此,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把握必须超越西方/中国的二元关系,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亚、非、拉世界。“晚清最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空间的孜孜探索使他们能够把差异和认同链接到一个临时性的综合论述中,指明中国民族主义的轨迹(271页)。”作者也正是沿着中国人对现代世界空间与时间的理解力的开拓,来思考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问题。

尽管作者对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都有着重要的突破,然而笔者仍然对些问题存有疑虑。比如作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思考,过分强调“民族”的现代起源,忽视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关民族的想象(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3年)。与此同时,在近代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作者几乎没有关注过人类学对中国

的人种论、民族论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就《世界大舞台》的中心主题,即近代中国人如何接受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制的历史叙述与合法性而言,作者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即,在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中,“民族”总是作为“国家”重要的参与者、保护者、决定者而体现出来。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这些概念模糊不清,甚至经历了严厉的质疑与广泛的争论,却又在1895-1905这短短的十年间被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一历史事实无疑是与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不平等的现代性的理解逐步深化有关。作者对这一过程的追溯与还原,对我们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

¹李凯航,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该文获得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近代日本‘琉球学’的成立与展开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人类共同体视域下的儒学与近代词研究基地”、“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繁荣计划项目”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²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